

中国古代铜镜年代的鉴定

李蔓王静

铜镜作为历史发展演变脉络十分清晰的文物类型，在古代各个时代都有其各自的特征，是十分重要的考古断代标尺器物。各个时期铜镜的纹饰、器型、铭文内容、尺寸等多有区别，本文将不同时期铜镜特点归纳总结，主要从铜镜大小、形制、镜钮、镜缘、纹饰、铭文和字形、铜镜色泽等方面进行梳理，以期起到参考借鉴的作用。

从大小鉴定铜镜的年代

各个时期铜镜大小区别较大，刚开始出现时镜型普遍偏小，战国时期逐渐增大，到两汉隋唐时期到达巅峰，宋金元明清又逐渐变小。

早期铜镜普遍偏小，一般不超过15厘米；战国铜镜种类丰富，直径以20厘米以内为多，晚期出现少数大而厚重的镜子，直径超过20厘米；两汉铜镜种类更加丰富，大小一般都在20厘米以内，东汉铜镜较西汉略大。西汉日光镜的直径一般在10厘米以内，昭明镜大小有几种规格，包括7厘米左右、10厘米左右、12厘米左右、14厘米左右；东汉铜镜一般在10厘米以上；魏晋南北朝铜镜较前期变小，一般在10厘米以内；隋唐铜镜大小一般在20厘米以内，少数花卉镜直径超过20厘米，但一般不超过28厘米；宋金铜镜直径一般在10厘米到20厘米之间；元代铜镜大小差异较大，从几厘米到二十几厘米均有，其中至元四年铜镜属于体量较大的一类，一般在20厘米以上；明清铜镜体量一般在几厘米到十几厘米之间，体量稍小。

从形制鉴定铜镜的年代

铜镜以圆形为主，从其出现到衰落，一直贯穿始终。圆镜最早见于齐家文化，战国时期镜面开始逐渐增大，宋代出现了带柄的圆镜。

方镜，始见于战国时期，作镂空式，数量很少。两汉时期也有少量方镜，南北朝时期则没见到。隋唐之际方镜再次出现，至金代，方镜衰微。花形镜，始见于南朝，盛于唐宋。以菱花和葵花形为主，也有作变形菱花状的，宋代出现了带柄的花形镜（图1），至明清而衰。亚字形镜，始见于唐，盛于五代北宋之际，衰于金代。八边形镜，仅见于唐代八卦镜和辽、金时期。盾形镜，即桃形镜，始见于北宋，流行于南宋、金时期，其中有带柄的。元代以后未见。钟形镜，仅见于宋。炉形镜，见于宋、元之际。

从镜钮鉴定铜镜的年代

每一时期铜镜镜钮有所区别，具体如下：弓形钮，作单轮或双轮状，形似弯弓。见于周初。三轮形钮，又称川字钮，桥形钮。钮面单薄，有三道凸脊，状如半环。战国晚期的三轮钮，平面作束腰状，秦汉之际也有作四轮形的，汉武帝以后不再出现。兽形钮，一般作镂空状。始见于战国末，西汉中期草叶纹镜中出现伏兽形钮，汉魏时期有在半球形钮上饰以兽形图案，隋唐瑞兽镜中则出现有圆雕状兽形钮。龟形钮，仅见于唐代镜。鼻形钮，作牛鼻状，钮的大小约占镜面1/20，多见于秦汉之际，唐宋镜中也偶见。半球形，见于两汉。西汉半球形钮较细小，仅占镜面直径的1/7或1/8。东汉半球形钮约占镜面直径的1/6。南朝及隋唐时期半球形钮间于半球形与鼻钮之间，显得比较圆润。扁圆形钮，始见于东汉末，盛行于三国，而衰于六朝。钮的直径约占镜面直径的1/4。少数明代镜钮也作扁圆形，但钮较小，约占镜面直径的1/6。连峰形钮，又称百乳钮。状如山峰相连，又似乳钉相聚，仅见于汉武帝时期的星云纹铜镜（图2）。平顶式圆形钮，状如鼻钮，而顶端较平。除少数唐代镜外，一般见于金元明镜。银锭形，仅见于金、元、明、清铜镜。圆饼形钮，钮作圆饼状，其上铸铭文或纹饰。常见于明清铜镜。方形钮，仅见于少数唐代镜及明、清镜。

从纹饰上鉴定铜镜的时代

商周时期，铜镜尚属初创阶段，形小质粗，仅饰以简单的几何纹和禽兽纹。

战国时期，铜镜的形制与纹饰趋向规范化。除少数素镜、纯地纹镂空镜和镶嵌工艺镜外，其主要图案为两重叠和三重叠构图，在地纹上饰主纹。地纹有羽纹和云雷纹等。纹饰主要包括花卉纹、山字纹、菱形纹、禽兽纹、蟠螭纹、羽鳞纹、连珠纹等。

秦汉之际，地纹镜继续流行，不同的是，地纹中出现了花样多变的织锦纹。其主纹作变形叶纹、散点式凤鸟纹及狩猎纹。西汉前期，织锦纹逐步被大涡纹所代替。汉武帝前后流行草叶纹。

西汉早中期主要流行的纹饰包括蟠螭纹、蟠蛇纹、草叶纹、星云纹等，后期流行连珠纹、重圈铭文、四乳禽兽纹等，西汉末年，到东汉初年，铜镜中与仙人、羽人有关的纹饰非常流行，同时还有四乳、四神和瑞兽等纹饰。铜镜边缘装饰则由波折纹逐渐演变为流云纹。其线条由细线白描变为浅浮雕、高浮雕。东汉铜镜上流行变形禽兽纹、神兽纹、夔龙（凤）纹、龙虎纹等，主题纹饰四神逐步为龙虎、神兽、东王公和西王母所代替。另有少量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，如吴王与伍子胥的故事，还有长袖舞、七盘舞等歌舞图案。
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铜镜铸造比较粗放，主要饰以神兽纹、变形四叶纹、夔凤（双夔）纹、瑞兽纹等。唐代铜镜纹饰布局灵活多变，有四神生肖纹、瑞兽纹、葡萄纹、花鸟纹、瑞花纹、神仙人物故事纹、盘龙纹、八卦纹、万字纹等（图3）。两宋时期铜镜图案装饰中往往吸取绘画中的花鸟人物，大多简约粗疏，娇柔纤细，出现很多神仙人物故事类方面的铜镜（图4），另外也有花鸟、缠枝花草、八卦、双龙双凤等题材。金代铜镜以双鱼（图5）、人物故事、盘龙、瑞兽、瑞花居多。元代铜镜纹饰以至元四年双龙（图6）、莲花、缠枝花、神仙人物、



素面为主。明清时期，铜镜铸造趋于衰落，纹饰以人物、杂宝（图7）、龙纹、花卉、吉祥铭文为主。

从铭文和字形鉴定铜镜的年代

铜镜自汉代开始出现铭文，字形以篆、隶为主，根据装饰特点而略有变化。一般说来，西汉前期以小篆为主，字形与泰山刻石相似。文景之际流行缪篆体，武帝以后则流行变形篆隶体。新莽东汉之际，则流行简化隶体。

两汉时期常见的铜镜铭文有：“见日之光，天下大明”“内清质以昭明，光象夫日月”“大乐富贵，千秋万岁”“日有熹，宜酒食”“尚方作镜真大巧，上有仙人不知老”“尚方作竟大毋伤，巧工刻之成文章”“吾作明镜，幽深三商”“（姓）氏乍镜四夷服”“（姓）氏作镜大无伤”“青盖作镜四夷服”“汉有善铜出丹阳”“洁白而事君”“长相思，毋相忘，尝富贵，乐未央”“凛治同华清而明，以之为镜宜文章”“长宜子孙”“位至三公”“君宜高官”等（图8）。

三国时期，铜镜铭文在吉祥语前多铸有年月、事由。隋唐时期，铜镜铭文字体趋向精工秀丽。常见的铭文以四言、五言诗为多，如：“玉匣盼看镜，轻灰暂拭尘，光如一片水，影照两边人”“赏得秦王镜，判不惜千金，非关欲照胆，特是自明心”。宋金铜镜中的铭文，出现了具有商标性质的牌号。如标明湖州、饶州、潭州、成都、建康等地名的铜镜，如“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”“湖州仪凤桥真正石家一色青铜镜”“湖州南石家真青铜镜子”。宋镜中铭文也时兴铸诗文，以七言、四言为主，如“清素传家，永用宝鉴”等。明清时期铜镜的铭文主要是一些吉祥用语，如“长命富贵”“金玉满堂”“鸾凤和鸣”“百寿团圆”“五子登科”“清闲”等。此外还有一些纪年镜，记述铸镜事由。

根据色泽鉴定铜镜的时代

铜镜是一种合金制品，主要是铜和锡、铅、锌合金。古代铜镜表面呈现的颜色不同，主要取决于合金成分及腐蚀产物的结构形态及其数量。表面以黑色化合物为主则呈黑色；以绿色化合物为主，则呈绿色。

由于铜镜中金属含量不同，其研磨面的呈色也可以反映出色彩的差别。一般说来，战国时期铜镜合金以铜、锡为主，铅的含量变化较大，其中铜含量主要集中在66%~72%，锡含量集中在20%~22%，此时期铜镜研磨断面呈银白色或淡黄色。

汉代铜镜的合金比例是比较稳定的，一般铜含量66%~70%，以67%~69%最普遍；锡以23%~24%左右最普遍；铅以4%~6%最普遍。铜镜断面多呈银白色，少量呈微黄色。唐代铜镜铜含量大体在69%左右，锡含量大体在25%，铅含量在5%左右，和汉代铜镜的合金比例大体一致，断面基本呈银白色。宋以后的铜镜成分发生巨大变化，其中锡含量减少，铅和锌含量增加，其中铜含量在68%左右，锡含量在10%以下，铅含量增加到7%~24%之间，锌含量有的达到了8%，铜镜断面呈黄色。明清铜镜的合金比例进一步变化，其中锡含量进一步减少，平均在5%左右，铅含量平均在8.5%左右，锌的比例进一步增大，平均在17.3%左右，最高到达23%左右，铜镜断面呈现黄赤色。

根据镜缘鉴定铜镜的时代

早期铜镜一般无缘，到了战国和汉代早期，镜缘为素平缘、素卷边、素高卷边、素低卷边、宽素卷边等，西汉中期以后，多为宽平缘或略凸的宽缘，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阶段，铜镜镜缘多见内缓外陡、呈三角形的镜缘，唐代除了早期的海兽葡萄镜为窄立缘外，其他多缘平缘，宋金元铜镜多见窄平缘，明清铜镜多见高窄卷立缘。

根据特定组合鉴定铜镜的时代

每个时期铜镜均有自己的特点，如西汉昭明镜为大圆钮、宽平缘组合，东汉吉祥铭文镜为球形钮、凸宽平缘组合，唐代海兽葡萄镜镜钮为伏兽钮，明代杂宝镜为银锭钮、吉祥铭文镜为圆平钮组合等，这些特征可以用于快速判断铜镜的年代及真伪。

浙江嘉兴位于太湖流域东南部、杭嘉湖平原腹地，地据苏、沪、杭三角地带的核心区域，自古以来便是鱼米之乡、江南粮仓，极为富庶。1860年，太平天国李秀成、李世贤等攻克嘉兴后，切断了清政府上海与杭州之间的联系。至1864年清军攻陷嘉兴以前，据守嘉兴的廖发寿部先后在嘉兴增高城墙，添设营垒。嘉兴博物馆收藏的太平天国文物便是这些军事活动的重要见证，也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珍贵资料，现遴选其中的四方碑刻浅析如下：

分路碑

嘉兴博物馆藏太平天国分路碑有两块。1954年发现的分路碑，出土地点位于嘉兴市西丽桥附近（图1）。此分路碑下部残缺，石碑残高67.5厘米，宽36.5厘米，厚15厘米。碑文阳文，上端右起横写“分路碑”三字，以下直写三行：右边“太平天国”四字，左边“孟春月吉”四字，中间“此路由城外”五字。1963年发现的分路碑，地点位于嘉兴北丽桥附近（图2）。石碑下部缺失，残高66.5厘米，宽32.5厘米，厚15.5厘米。碑文阳文，右侧碑文有“太平天国癸”五字，左边有“孟春月吉旦”五字，中间为“路由城外”四字。

据文献记载，太平天国占领嘉兴时间是1860年至1864年。通过对1954年发现的分路碑上“太平天国”、“孟春月吉”等碑文笔画痕迹的观察，结合1963年发现的分路碑上“太平天国癸”及“孟春月吉旦”等碑文，可以推断这两块石碑的设立时间应为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。农历一年分为孟春、仲春、季春、孟夏、仲夏、季夏，以此类推，分别代表正月至腊月等十二个月，故可知孟春月为正月，而吉旦则表示每月初一。综上所述，这两块分路碑成于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正月初一，即1863年正月初一。

分路碑一般立于道路分叉口，用来指示方向，相当于现在的指路牌，应起源于古代用于表示里程的“墩”。“墩”亦称为路墩、里墩，是古时路旁封土而成、用以分界或记里程的土堆。在南北朝时期，官道旁的土墩每隔一里设置一处，发展到后来以树代替墩，也是“一里种一树”。除了土墩、树墩外，还有碑墩，如北宋汲县河堤墩碑，碑的正面中间一行刻“汲县河堤下界十里”，右边刻“西至上界永”，左边刻“福村八十里”。这些“墩”主要是用来分界指向、计算里程，便于行人辨认的，之后便发展成了分路碑。清末时期，在我国西南地区，这种分路碑还被赋予了祈福避祸的功能。如湖南发现的清代“蔡良寅（蔡爵）分路碑”，上刻“长命富贵”四字，下刻“弓开弦断，箭来神挡；右走石下江，左走山门；信士蔡正陵男良寅；光绪九年二月立”字样，这种“分路碑”又被称之为“挡箭碑”。

目前发现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分路碑有三块，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太平天国分路碑，碑左方左有一“路”字，右上方残缺部分推测为“分”字，中间两行是“右至襄安”和“左至虹家桥”，碑左方是“太平天国己未九年”。嘉兴博物馆藏的这两件分路碑分别发现于西丽桥和北丽桥，也就是嘉兴城的西门和北门附近，说明这两块分路碑所在的位置应为起点。碑刻正文有“此路由城外”、“路由城外”等字样，参考南京太平天国馆藏的分路碑，推测其完整内容应为“此路由城外前往某某处”。

从文献记载看，太平军据守嘉兴时期的军事活动较为频繁。1862年7月，听王陈炳文出师援天京，满天王廖发寿代守嘉兴。10月，清江南提督黄翼升率军自苏州附近进攻嘉善北部，陈炳文败归。1863年7月，荣王廖发寿率军占领桐乡和濮院。李鸿章部副将程学启率军进逼苏州。荣王廖发寿率领太平军支援，与淮军和洋兵常胜军在嘉善枫泾、吴江等地激战。每一次军事活动都涉及兵马调动及战术部署，而1863年正月所立的这两块分路碑位于西门和北门的分路碑，无疑是太平军从嘉兴出发行军的指路碑，是其主动进攻性战术的见证。1913年，在江苏无锡黄埠墩河道中出水了三门火炮，上有“癸开十三年小春月”、“荣王殿下监制”等铭文，一方面表明至迟在癸开十三年的一月，廖发寿便已升任荣王旁千岁。另一方面，笔者认为这两门火炮在江苏无锡出现，或为廖发寿1863年吴江方向作战失利并被清军所俘获的结果。李鸿章在1863年10月给左宗棠的信中写道：“九月望日，程学启大败伪荣王、会王于八

嘉兴博物馆藏太平天国碑刻浅析

时西奇豆丽丽



图1 1954年发现的分路碑
图2 1963年发现的分路碑

斥、平望、捣贼近万”，荣王即廖发寿。这一战也使得廖发寿试图打通苏嘉两地联系的作战计划落空，至同年12月，苏州陷落，太平军据守的嘉兴形势急转而下，进入防守阶段。

嘉兴博物馆藏的太平天国炮台碑有两组，分别为永安炮台碑和长乐炮台碑。

永安炮台碑，1928年出土于嘉兴县西门门外。由碑额和碑文两块组成，皆由早期残碑改制而成（图3）。现碑额长89厘米，宽31厘米，厚15厘米，上有“永安炮台”四字双钩阴刻。碑文部分较为完整，上端横写“太平天国”四字，下直写七行，其中首行“荣”字高出一字，末行“开”字低一字署。内容为“荣王旁千岁守禾四年，增高城郭，添造炮台，以成万年永远之基。癸开春仲，复于大西门兴修炮台，以壮军威，而防胡妖，诚筹备之至善也。名曰永安，取永久平安之义。王既竣，爰志其由来于石。开朝勋臣救天燕杨得顺撰”。

长乐炮台碑，1935年出土于嘉兴南门城墙根。由碑额和碑文两块组成，皆由早期残碑改制而成，原碑文隐约可见（图4）。现碑额长60厘米，宽44厘米，厚15厘米，上有“长乐炮台”四字横写阴刻。碑文行楷直写，阴刻六行，其中首行“荣”字高出一字，末行“开”字低三字署。碑文内容为“荣王旁千岁之治禾邦也，于四门之隅添设炮台，以壮军威而靖胡氛。因命得顺司厥事。癸开季夏，南城炮台又将告竣，遂名之曰长乐。取朝祥绵长，长乐未央之意。勒诸石以志不朽云尔。开朝勋臣救天燕杨得顺撰”。

这两组碑刻的主要区别有两点：一是碑刻字体风格及雕刻方式略有不同，应是不同时间所书写的结果；二是格式上，两组碑文首字皆高出一字，而未行“开”字永安炮台低一字署，长乐炮台低三字署。从内容上看，这两组均是记载荣王旁千岁统辖嘉兴期间，增筑炮台的事情。碑文中的“荣王旁千岁”即廖发寿，早期为忠王李秀成部将，先后封满天安、满天元、殿前忠诚天将、荣王。1860年，随军攻克嘉兴，与朗天安陈炳文同时镇守。1861年底，陈炳文调守杭州后，任嘉兴佐将，期间增高城墙，添设营垒，加强防守。1863年1月，李鸿章督率由常胜军和淮军组成的联合武装进攻亦福晋，长兴出兵协助杨王李明成反攻。10月，率军攻打吴江，增援苏州。1864年3月，嘉兴失守被俘，不屈就义。碑文中“之治禾邦”、“守禾四年”是指至1863年太平军统辖嘉兴已有四年，期间采取增高城郭，在四个城门添造炮台等措施壮军威、靖胡氛，以求成万年之基。其中永安炮台为西门炮台，长乐炮台为南门炮台，另外两门炮台碑刻尚未发现。修建时间方面，永安炮台碑文载“癸开春仲，复于大西门兴修炮台”，是指1863年2月修建。长乐炮台碑文载“癸开季夏南城又将告竣”，是指1863年6月即将竣工。从两碑落款可知，炮台监制与碑文撰写均是开朝勋臣救天燕杨得顺负责。在太平天国后期，爵位由之前的王、侯扩充为王、天将、朝将、义、安、福、燕、豫、侯等，封授无度，如1861年底只见忠诚三十六天将，1862年底见忠诚二百一十三天将，1863年9月已见三百九十三天将。而碑文中的救天燕，因后期封爵泛滥，实为太平天国后期等级较低的爵位的一种。开朝勋臣更是一种虚衔，如《探穴纪略》中载“复以咸丰三年前者加开朝王宗，十年前加开朝勋臣，后者加真忠报国，皆虚衔也”。从上述碑文看这两组碑刻记载了太平军在1863年修筑炮台的事情，名称赋予美好意愿，并通过刻石立铭，以垂后世。

这两组炮台碑建于太平天国后期廖发寿败守嘉兴之前，均是积极主动备战措施。1863年，驻守苏州的纳王邵永宽等献城投降，廖发寿支援苏州的战略意图落空，为程学启所败后回防嘉兴。至1864年2月，太平军平湖、乍浦、海盐、嘉善、海宁等地守将先后降清，嘉兴城四面楚歌，形势危急，由此开始全面进入被动防守阶段。1864年正月，李鸿章部程学启率淮军、洋枪队等，发起对嘉兴的进攻。驻守湖州的堵王黄文金两次率军救援嘉兴，都为程学启所挫败。3月，在多方势力的联合进攻下，孤立无援的嘉兴城最终陷落，挺王刘得功阵亡，荣王廖发寿被俘杀，长达四年的嘉兴太平天国政权就此结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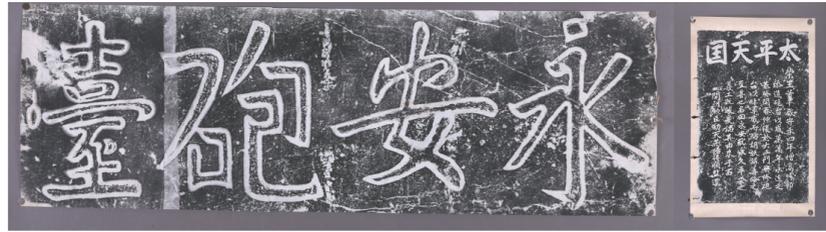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 永安炮台碑额、碑文拓片



图4 长乐炮台碑额、碑文拓片